

# 清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构建

——以《盛京通志》的纂修与传播为例

张一弛 刘凤云

**【摘要】** 清人四次纂修《盛京通志》。康熙、雍正两朝所修《盛京通志》是《一统志》纂修的一部分，地方当局通过纂辑盛京地区风土人情，体现清朝统治疆域的广度。乾隆朝纂成两部《盛京通志》则向中央典籍转型，将侧重点变为塑造清朝起源的共同历史记忆，从而构筑中央政治权威。它们共同构成了盛清时期多种面相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作为读者的文人士大夫在阅读该书时，主要关注点却不在于政治文化的主旨，而在于书中包含的丰富知识，反映出士人对朝廷政治文化建构的微妙疏离感。

**【关键词】** 盛京通志；政治文化；大一统；地方性

**【作者简介】** 张一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集体的政治体系乃至文明，其政治行为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文化的因素，这种文化因素构成了“政治文化”这一重要概念。<sup>①</sup>政治文化在传统中形成，又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反复调整。探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在历史上的构建，对于了解中国内部统一性的由来，乃至中华文明的特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sup>②</sup>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统治者广泛利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资源，构建了多元的政治文化，从而巩固了自身统治、强化了政治凝聚力，为今人思考政治文化的现实作用提供了历史的镜鉴。

目前对清代政治文化的构建过程，主要的研究范式有两类。其一是基于传统的学术史脉络，结合儒学文本和士大夫个人经历，重点考察清朝文化政策中崇儒重礼、师法程朱的一面，探讨儒家思想与清朝国家体制的结合及其地方实践。<sup>③</sup>其二则以西方“新清史”研究为代表，强调族群观念差异的作用，考察盛清时期皇帝如何在汲取来自内陆亚洲文化资源的同时，保持满洲族群文化特色与优势，强化对庞大“帝国”的统治权威。<sup>④</sup>而在这两类范式以外，近年来一种新的政治史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即跳出单纯学术史、“新清史”研究这两种范式的“汉—满”对立视角，将关注点从概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城考古与清代历史文化研究”（14ZDB038）

<sup>①</sup>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156-1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肖唐镖、余泓波：《近3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回顾与展望》，载《政治学研究》，2015（4）。

<sup>②</sup>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sup>③</sup>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1-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150-17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sup>④</sup> Michael G.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14-33; 柯娇燕：《中国皇权的多维性》，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53-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括文化形态转向描述文化建构的政治语境与媒介，考察清朝如何运用自身的文教体制，书写、宣扬政治文化概念，影响观念世界，从而确立统治合法性。<sup>①</sup>

这一新兴范式的研究重点之一，便是以“大一统”作为描述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重要概念，在清代政治文化构建过程中的充实和具象化。杨念群认为，源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国家概念，强调了统一形态的重要性，它包含疆域控制、王朝正统性的确立、种族与文化关系等多个层次的丰富内容，其内涵值得重新加以整理和辨析。<sup>②</sup> 康乾时期，清朝采取了多样的文化策略，通过一系列方志、典籍等图书编纂活动，塑造“大一统”概念的文化内涵。<sup>③</sup> 在这一过程中，清朝对“大一统”概念内涵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这在图书等媒介中有所体现。而对康乾时期“大一统”概念的建构过程及语境的考察，可以透视出清代政治文化的多元性、层次性，加深对清朝国家如何树立统治合法性的认识。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亦即从《盛京通志》这一官修方志的过程与实态考察盛清时期政治文化的资源和语境。在清代，“盛京”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涵盖了东北相当广阔的区域，不仅是清朝统治之下的边疆地带，也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发祥之地，清廷对此地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sup>④</sup> 与此相应，《盛京通志》在清代官修方志中的地位也非常显要。以往学界对这部方志的研究，主要是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就版本信息整理方面做了努力。<sup>⑤</sup> 据前人考证，《盛京通志》前后有四个版本系统：一是康熙年间纂修之本。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刻本，三十二卷，奉天府尹董秉忠等主持编纂，后曾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增刻，内容稍有增添。以下将这一系统称为“康熙志”。二是雍正后期纂修之本，雍正十二年（1734年）初稿，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乾隆元年（1736年）正式刊刻，后于咸丰二年（1852年）增修、补刻，四十八卷，奉天府尹吕耀曾等官员主持编纂。以下将这一系统称为“雍正志”。三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刻本，三十二卷，刑部尚书汪由敦主持编纂。以下将这一版本简称为“乾隆志”。四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敕命编撰，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武英殿刻本、活字本等，一百三十卷，大学士阿桂主持编纂，后抄入《四库全书》。以下将这一系统简称“钦定志”。<sup>⑥</sup>

事实上，清廷多次重修《盛京通志》，并不仅是简单地续补旧章，而是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基于多种资料来源，不断修订体例和内容，使得《盛京通志》从《一统志》纂修工程的一部分变为独立且卷帙浩繁的一部方志，其主旨从宣扬疆域的广度变为塑造清朝“法祖”的政治理念与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其定位从侧重于“大”的地方性知识载体变为侧重于“一统”的中央性典籍。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朝廷主导下文化事业重心的转变，亦即以“大一统”观念为代表的清朝政治文化的大力倡导。另一个方面上，清朝士人对《盛京通志》的关注及阅读体验，则可以体现出他们对上述官方政治文化建构过程的回应与态度。

① 刘风云：《陪都盛京：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政治与文化选择》，载《清史研究》，2018（2）；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郭院林：《道的拓展与文的突破——乾隆帝〈开惑论〉分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16（4）。

② 杨念群：《论“大一统”观的近代形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1）。

③ 王大为：《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261-297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

④ 刘风云：《奠都盛京：清朝入关前文化体系的构建》，载《清史研究》，2016（3）。

⑤ 前人对《盛京通志》的研究可参见陈加：《盛京通志纂修考》，载《图书馆学刊》，1980（3）；郝瑶甫：《东北地方志考略》，8-1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郑永昌：《百年变迁：清初〈盛京通志〉的编纂及其内容探析》，载《故宫学术季刊》（台北），2015（2）。

⑥ 陈加等编：《辽宁地方志论略》，44-61页，沈阳，辽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

本文重新审视这一方志的四次纂修过程<sup>①</sup>,利用清宫档案与海外孤本汉籍等前人未加措意的史料,重点梳理各版纂修背景、编纂方式与资料来源,以此考察不同层级的官方意志对图书纂修过程的介入,进而探讨该书背后清朝国家构建政治文化的进程。

## 一、乾隆以前的《盛京通志》纂修:彰显地方特色

前两次修撰《盛京通志》都是以《一统志》编纂过程的一部分而展开的。作为清初朝廷“昭大一统之盛”的懋典,《一统志》编纂目的在于以叙述清朝统治之下各地及朝贡国自然地理、社会风貌的方式,宣示清朝四海统一、疆域广袤<sup>②</sup>,与“大一统”价值观中疆域观念的塑造存在紧密的联系。故而该书编撰者需要广泛收集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各地风土政情等信息,乃有康熙、雍正两次纂修《盛京通志》一事。本节将梳理两部志书的编纂过程,并结合编纂宗旨、资料来源来分析两部书的侧重点。

### (一) 草创体例:“康熙志”的纂修

《一统志》的编纂形式,是先由各省编成省级的“通志”,呈交《一统志》修书馆,修书馆在省级“通志”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成书。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廷敕下各省纂修通志,是为《一统志》纂修之始,旋因“三藩之乱”而暂停;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夏,朝廷再命各省继续纂修。<sup>③</sup>《盛京通志》的纂修工作便因此而起,正如“康熙志”编者之一张鼎彝所述:“我皇上……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昭来兹。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汇辑为诸省弁冕。”<sup>④</sup>

康熙中期著名的文人陈梦雷,缘事流放奉天尚阳堡,参与了康熙《盛京通志》的编修,提及该书因“文献莫资,十余年弗就”,董秉忠上任后“督辑甚迫”,陈梦雷之友人、承德县知县曾大升“乃聚帅幕、延同事,日夕考订”,“未几年,而五六千里輿图如指诸掌。”<sup>⑤</sup>由陈梦雷的说法可知,《盛京通志》纂修工作在康熙十一年后长期停顿,直到康熙二十二年董秉忠到任加以督促,不到一年便付梓。这便是首部《盛京通志》的成书过程。

《盛京通志》逡巡十载后骤然成书,颇得益于盛京当地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提供了东北地方政治、社会的具体情况。目前所见,“康熙志”取材范围主要有三类文献。其一是明代编纂、清初已稀见的辽东方志,特别是正统年间初纂的《辽东志》。诚然,“康熙志”凡例声称《辽东志》“舛误尤多”,“兵燹之余,无复蠹简”,否认两书关联;然而,据后人金毓黻考证,康熙《盛京通志》“不注所出”而与《辽东志》字句相同之处“不下数百事”,进而认定“康熙志”乃基于《辽东志》加以增益,“复讳所出”<sup>⑥</sup>。第二类文献则是所谓“各属新志”,亦即盛京所辖州县在康熙中期新纂成的方志,例如“康熙志”卷七《星野志》为《辽东志》所无,乃是直接抄录自康熙二十一年成书的《盖平县志》。第三类文献则是盛京地区官署所藏的档册,即编者所谓:“凡事关国朝典制,皆咨请四部、内务府历查旧案,往返再三,然后入志”<sup>⑦</sup>。

从上述编纂过程可以看到,康熙《盛京通志》通过收集地方文献中的有用信息,纂为史志,知

① 关于书籍史研究视角的创新之处,可参见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1-21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近年来中国史领域内书籍史研究的概况可参见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载《新史学》(台北),2009(1)。

② 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1、297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

③ 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载《清史研究》,2008(1)。

④ 伊把汉等纂:《盛京通志》,3b页,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HOLLIS编号:990080625400203941。

⑤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九,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9册,3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⑥ 金毓黻:《校印辽东志叙》,载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第1册,345页,沈阳,辽沈书社,1985。

⑦ 伊把汉等纂:《盛京通志》,2b页,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HOLLIS编号:990080625400203941。

识背景上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色，为《一统志》提供关于盛京当地的情报，以此助力朝廷塑造“大一统”文化的空间广度，所谓：“统志以天下言，通志以一省言，不越户庭而周知海内者，志为之也”<sup>①</sup>，这本是康熙《盛京通志》的宗旨。至于其他内容则并非该书所措意，例如，清初八旗勋贵功臣于盛京多有关系，但康熙《盛京通志》中对此几无一语。编者在凡例中有所解释：“天潢名书玉牒，勋爵绩在旂常，自当求之天府，未敢稽于闻问也”<sup>②</sup>，亦即应由朝廷亲加记述，非一方志书所应载笔。可见“康熙志”编者站在地方性的角度，对材料选择的尺度抱持谨慎态度。

“康熙志”纂修成书后进呈朝廷以为纂修《一统志》之用，然而《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却迭遭变故，承担修书的徐乾学、韩爌先后病逝，纂修事业遂告搁置。<sup>③</sup>

## （二）充实完善：“雍正志”的纂修

雍正初年，清廷重启《一统志》修书工作，重修《盛京通志》的工作便以此展开，所纂成的便是“雍正志”。据署理奉天府府尹王河称，雍正十二年（1734年）夏，《盛京通志》重修工作正式开始；是年，王河曾题奏进呈“所有已经纂就盛京通志抄本”一部，即系初稿。<sup>④</sup>大约同时，新任奉天府府尹宋筠到任，接手编纂工作，将“各处覆询之事”续加增补，七个月后、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次年付梓，进呈《一统志》修书馆<sup>⑤</sup>，宣告《盛京通志》第一次重修完成。

与“康熙志”相比，“雍正志”利用各地新搜集的资料，做了大量添改。其中增添的重点是世宗所降诏敕和清朝盛京地方人物事迹。“雍正志”仿广东省志体例设“典谟”一门，添补了康熙后期及雍正朝的皇帝诏敕。其中雍正朝诏敕有十条，包括“谕老农”“谕州县”“谕知府”“谕耕耜”“谕重农”等，皆系劝诫官员爱养黎元、士民各守本分之语。今人看来，这些诏敕颇为空洞，有累赘之嫌；但对纂修者而言，体例要求他们必须搜集地方官署中保存的“纶音”，故而即便可用资料有限，也要强加拣选。在这一问题上，地方文献的视野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

关于人物事迹的增添，清世宗谕令各省重修通志时，特别指出：“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sup>⑥</sup>。在皇帝的要求下，盛京地方纂修者添补了“康熙志”中缺失的清朝人物记述。编者在凡例中称：“今博采书传，兼访耆旧，凡真知灼见者皆备书之；见闻不逮者，仍阙以俟考。”<sup>⑦</sup>换言之，编者的资料来源是当地所见书籍和“耆旧”的口述，这令“雍正志”对地方人物的记载仍保持了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名宦志》中简要地记述了清初张尚贤、安珠瑚等人在盛京地区为官的政绩，安珠瑚在顺治中曾随征山东、江南，颇有战功，而“雍正志”未置一词，仅称其“骨鲠简重，得大臣体”，这当然是由于“耆旧”不知其事，“见闻不逮”的缘故<sup>⑧</sup>。再如镶白旗满洲人车克，“雍正志”记其人于松锦之战中击破洪承畴“声势颇盛”之三营步兵等事，突出其勇猛善战<sup>⑨</sup>，较之后来中央纂修的国史馆传记更为形象。这些来自“耆旧”的口述，丰富了《盛京通志》的内容，令地方志体现出了裨补官修史籍的作用。

总之，《盛京通志》在清初的两次纂修，均是在盛京当地官员主导下，为配合《一统志》修书事业，通过稽考档案志书、采访当地人士等方式收集盛京地方信息，复加整理而成。故而这两部

①② 伊把汉等纂：《盛京通志》，1b、5a页，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HOLLIS编号：990080625400203941。

③ 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载《齐鲁学刊》，1997（1）。

④ 《户部咨为催取各省未到志书事》，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108316-001。这部初稿现藏国家图书馆（系统号：001812997），仅有三十三卷，可知尚未完竣。

⑤ 吕耀曾等纂：《盛京通志》，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册，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奉天府尹宋筠题本》，乾隆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02-01-04-12936-030。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六年十二月十二日，2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⑦ 吕耀曾等纂：《盛京通志》，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册，22-2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⑧⑨ 吕耀曾等纂：《盛京通志》，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3册，1679-1680、191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盛京通志》均是盛京地方特色的体现。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盛京通志》通过输送地方情报的方式,充当了“大一统”价值观中疆域观念的媒介。乾隆三年(1738年),礼部尚书任兰枝奏称《一统志》中盛京的部分已经缮写完毕、交付刊刻<sup>①</sup>,看上去《盛京通志》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然而《盛京通志》的纂修史却并未到此而中止——乾隆朝又对《盛京通志》进行了两次重修,令它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

## 二、乾隆时期两次重修:塑造共同记忆

清高宗即位后,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向政治文化中增添了更多的元素,力图结合“敬天”与“法祖”两方面的文化资源,塑造关于清朝发祥的共同记忆,以确立其统治权威。在这一背景下,“盛京”不再仅是地理概念,而被转化为政治观念上的一个符号,赋予了厚重的文化意义。高宗在御制《盛京赋》中,通过描绘心中“盛京”的方式,阐明了这一关联:盛京地区自然环境优渥、社会风俗淳朴,代表清朝国统得自天眷、人民沐浴德化;而清朝在此肇基建都的历史,则启示后人应“以祖宗之心为心”,不可“忘本而泯良”<sup>②</sup>。很明显,这是塑造共同记忆以强化政治认同的手段。<sup>③</sup>

为配合这一政治文化建构过程,乾隆朝两次重修《盛京通志》,将该书改造为展现“盛京”全新含义、强调“大一统”价值观中共同记忆的媒介。本节将重点从纂修背景、资料来源两方面考察这两次重修的指导思想与知识谱系,以此分析新修《盛京通志》的意义。

### (一) 改弦易辙:“乾隆志”的纂修

“雍正志”成书未久,高宗即钦命再行重修。这一版《盛京通志》即“乾隆志”,存世极少,于官修典籍中多不见著录,编纂过程堪称扑朔迷离。据陈加的看法,“乾隆志”系删削“雍正志”而来,体例上亦有所调整,以求“简严精核”。前人对“乾隆志”所知大致如此。

然而事实上,第三次纂修的“乾隆志”在《盛京通志》纂修史中地位非常重要。该书纂修背景,据《国朝宫史》所记,乃乾隆八年(1743年)高宗东巡盛京时“敬瞻列祖开创之绩、陪京宏盛之规”,乃嫌“旧纂《通志》一书未为精核”,特命重修。<sup>④</sup>换言之,这次纂修,是高宗首次东巡谒陵的后续举措,亦是高宗树立“盛京”政治符号的重要手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乾隆志”,根据这一稀见藏品加以比对,“乾隆志”对“雍正志”的删改里,幅度较大的主要有二。

第一点是将“雍正志”所录谕旨进行了抽换。“乾隆志”卷三载清世宗谕旨14条,与“雍正志”相比仅有一条得到保留,其余均系新增。新入选谕旨并非单纯的劝民、诫官之语,而是针对具体事件或政策而发表的、有明确内容的上谕,使可读性大为提升,一改“雍正志”空洞之阙。例如,雍正九年(1731年),奉天府永吉州知州杜薰缘事革职,该州士民呈请将该人留任;当年二月初八日,皇帝颁谕,申明此类呈请理应拒绝,但盛京“极边之地,人情质朴,非内地可比”,故而特旨准允。这类针对具体事件的上谕为“乾隆志”所收录。<sup>⑤</sup>乾隆六年(1741年),《清世宗实录》

① 《礼部尚书任兰枝奏为纂修一统志书事》,乾隆三年六月十八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186113-001。

② 张一弛:《御制〈盛京赋〉与清代政治文化:以〈盛京赋〉的发布、传播与阅读为中心》,载《清史研究》,2018(1)。

③ 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曾考察过这种基于政治文化视角所制造的“地方印象”,指出这种“淳厚”“洁净”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塑造的结果。参见Schlesinger Jonathan,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67-173.

④ 鄂尔泰等编:《国朝宫史》,卷三〇,60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⑤ 汪由敦纂:《盛京通志》,卷三,9a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登录号:故志012501。

《上谕内阁》等典籍政书依次纂成，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对世宗一朝史事的定论。核对具体行文措辞，可知“雍正志”中的谕旨均源自《上谕内阁》。在这一变动中，基于中央贮存档册而编纂的政书，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盛京地方所保存的档案、文献，成为编纂者修改《盛京通志》时的信息来源。

第二点重要的变化是关于清朝人物事迹的记载再次发生大幅变动，删去许多旧有人物，添加清初功臣传略。“乾隆志”卷二十一《本朝人物》有按语，阐明了编者理念：

帝王之兴，豪杰景从，斯功名腾蹕之会也。太祖太宗始廓东夏，左右先后与夫师武臣，翊运奏功，材猷至重，简载莫罄焉……郡国之牒固与史例同严尔，其先后叙次，略依《八旗通志》分列。<sup>①</sup>

汪由敦之意，在于强调“表志勋烈”的重要性：清初“豪杰”在“帝王之兴”中功勋卓著、“简载莫罄”，故而《盛京通志》在记载当地人物时，不仅要反映盛京地方人士眼中的“名人”，更应该体现那些在清朝开国史事中著有功绩之人，亦即朝廷眼中的“名人”。这一变动打破了“康熙志”处理“绩在旂常”之人的义例，显然逾越了一般意义上方志的定位，标志着《盛京通志》的侧重点发生了改变。

与增补谕旨相似的是，“乾隆志”在增补功臣传略时也援引了中央编订的史书。汪由敦在按语中称，其资料来自乾隆九年（1744年）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sup>②</sup>考其行文，可知汪由敦所言不虚<sup>③</sup>，官修典籍扩大了汪由敦纂修《盛京通志》的资料，如“本朝人物”一目遍叙数十位国朝勋旧，事迹明白可考，这在“康熙志”和“雍正志”纂修时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乾隆志”相对于“雍正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汪由敦身在北京，并未前往盛京亲自访查风土，亦未行文盛京当局寻求意见，而是利用乾隆初年由朝廷纂修、保存在北京的政典、史书修成了这部东北地区的方志。这一由全新文献提供的视野，不仅丰富了《盛京通志》的内容，也令“乾隆志”从知识维度和书写视角两个方面实现了由地方文献向中央典籍的过渡。这一变动为清高宗构建的、蕴含了政治文化内涵的“盛京”观念提供了一个注脚，盛京地方志不再单纯是一方风土的介绍，而是关乎一朝统胤所系的“钜典”。

“乾隆志”的这一变动，背后的重要因素是高宗的个人意志。该志成书时，《一统志》尚未刻竣，高宗一度曾命撤回《一统志》中关于盛京的部分，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仍然“未蒙发下”<sup>④</sup>。以往研究将此事归咎于盛京志书办理延宕<sup>⑤</sup>，然而根据“乾隆志”的纂修背景可知，高宗是有意以此为据重订《一统志》中盛京的部分。

## （二）终成钜典：“钦定志”的纂修

清朝最后一次官修《盛京通志》，亦即“钦定志”的纂修，起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高宗第三次东巡盛京时。此次东巡，皇帝曾发表一道长篇谕旨，强调展谒盛京皇陵、怀念祖宗德业的意义，要后世子孙“处尊位而常缅前劳，览当年原轍而兴思，拜旧里松楸而感恫，自必凜然于天眷之何以久膺、憬然于先泽之何以善继，知守成之难，兢兢业业，永保勿坠”<sup>⑥</sup>。这是继乾隆八年谒陵

① 汪由敦纂：《盛京通志》，卷二一，1a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登录号：故志012501。

② 项旋：《清代殿本著录订误》，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02）。

③ 例如卷二十一上“明安”条，便系删减自《八旗通志》初集之《明安传》。参见汪由敦纂：《盛京通志》，卷二一，21a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登录号：故志012501。鄂尔泰等编：《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四七，3786-3787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④ 《一统志移会内阁典籍厅为收掌官恭候志书由》，乾隆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200529-001。

⑤ 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大清一统志〉研究》，208-209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乾隆朝上谕档》，第9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一日，289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之后,高宗再次以解读“盛京”这一符号来申明“缔造之艰难”的内涵。故而,第四次纂修的“钦定志”与第三次纂修的“乾隆志”在纂修背景上也是相似的,均是要以方志的形式申说作为政治符号的“盛京”,强调清朝受命于天、祖宗有德,其统治具有合法性。

然而应该看到,高宗最后一次敕撰《盛京通志》,并非如乾隆八年一样是谒陵活动的附属物。这一时期,朝廷迭修懋典,尤其是追述开国缔造史事、论证满洲统治秩序的书籍,屡见纂辑,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馆的《皇清开国方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开馆的《满洲源流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的《满洲实录》等。可以看到,从乾隆中叶《四库全书》开馆后,清朝政府便一再以官方史籍纂修这一文化工程的形式,反复重申朝廷在观念世界中其权力的正统地位,不断深化巩固政治文化建构的成果。

这些典籍既是第四次纂修的“钦定志”的观念背景,也为实际纂修工作提供了标杆。好大喜功的清高宗表示“乾隆志”仅三十二卷,“叙事简略”,体例亦有不足,为新修《盛京通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勒为定本”<sup>①</sup>。修书馆总裁官由大学士阿桂领衔,包括和珅等七位朝廷高级官员,是《盛京通志》历次纂修中规格最高的一次。“钦定志”卷首录有该书进呈时的表文,概括了该书的纂修宗旨:“景发祥于先叶,永怀缔造艰难;牐纪实于陪京,备见风谣淳古。千盘陵寝,天成虎踞之形;一统山河,地是龙兴之旧。猷时巡而稽典,敬展珠邱,订前志以勒书,辉腾壁府”<sup>②</sup>。

在纂修者看来,盛京之所以值得“订前志以勒书”,在于此地“天成虎踞之形”“地是龙兴之旧”,因而该书的目的是要“景发祥于先叶,永怀缔造艰难”,亦即将编纂重点放在展现“盛京”所代表的满洲起源传说和开国史事上,以应和高宗“时巡而稽典,敬展珠邱”时的论断。

“钦定志”在篇幅上长达一百三十卷,超过此前各版卷数之和。根据该书凡例,添入的内容主要有三:其一是补入吉林、黑龙江地区以往遗漏的情况,令该书涵盖整个东北地区;其二是补充乾隆八年以后高宗卷帙浩繁的御制诗文;其三是根据国史馆所编传记进一步增补清初功臣传略。后两种改动与盛京地方风土并无太大关系,但在“钦定志”中占超过四分之一,大大挤压了原有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钦定志”凡例中声称“谨稽五朝《实录》《圣训》、诏谕、碑记、诗文,冠列卷端”<sup>③</sup>,强调资料来源为馆藏钜典,特别是首次采用《清实录》这一尊藏皇史宬的重要史书,与乾隆后期典籍从知识来源上融为一体。来源“谨严”的资料固然丰富了方志的内容,但也意味着“钦定志”中来自中央的信息所占比重进一步加大。在具体纂修中,对地方文献、情报的挤压亦属当然。该书卷首所录编纂校对诸臣皆任职中央,盛京当地官员未得一与。在需要补充乾隆八年以后东北地区任职官员的姓名、旗属、在任时间等信息时,也是移咨在京八旗各衙门,命各旗作速查明“所有乾隆八年以后各该旗员曾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处官”之人的情况,汇总详报。<sup>④</sup>

总之,“钦定志”在各版《盛京通志》之中,无疑是内容最为充实、编纂最为严格的一部,从编纂背景、主旨到资料来源,都有来自中央的深度介入。“钦定志”成书后由武英殿刊刻,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抄入《四库全书》<sup>⑤</sup>,是为四部《盛京通志》唯一得入《四库全书》者,足见高宗对该书甚是满意。朝廷此举,目的是申说统一的历史记忆,以此彰显“大一统”观念中“一统”的一面。诚然,无论疆域观念还是共同的历史记忆,都是“大一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从《盛京通志》的纂修史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建构活动,其侧重点有所转移。这种转移通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乾隆朝上谕档》,第9册,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一日,289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九一,886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②③ 阿桂等编:《盛京通志》,2、6页,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④ 《值年旗咨称票签处奉旨重修盛京通志事》,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六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档案,05-13-002-000455-0079。

⑤ 金毓黻辑:《金毓黻手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319-320页,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



过朝廷主持下的修书工作得以实现，它反映出清朝统治者把握国家意识形态的能力。

### 三、《盛京通志》的流通和阅读：政治文化

图书的文化史意义，不仅体现在编纂过程中，也体现在流通与阅读中。如果说书籍的纂修代表了政治文化构建过程中实体媒介的生产，那么书籍的传播便代表了这种媒介的获取和接受。二者语境虽有区别，但通过对图书流通、传播乃至阅读体验的考察，一方面可以验证清朝文化政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可超出文本分析，在实体媒介的层面上透视清廷掌控政治文化构建过程的能力。具体到《盛京通志》，清人对它的不同版本的流通与阅读也呈现出不同的取向。本节将首先梳理几部《盛京通志》的传播情况，然后以清代士人对《盛京通志》的征引和讨论为依据，考察这些阅读经历的语境和意义。

#### （一）《盛京通志》的传阅方式

对于“康熙志”和“雍正志”而言，民间流传是读者获取的主要方式。明清之际，东北地区地处边塞，图书出版业亦不发达，大规模刊刻《盛京通志》并予以销售，事所难能。关内士人想要阅读该书，大约以私下传阅为主。康熙二十八年（1688年）冬，承担《一统志》纂修任务的徐乾学休致回籍，行前奏称盛京地区“无有故牘可稽”，希望朝廷能尽快纂成《盛京通志》寄付书馆。<sup>①</sup>事实上此时“康熙志”已纂成四年，而徐竟不得知，可见此书传播的局限性。徐乾学家藏《传是楼书目》中记有此书，但不全，仅有五本<sup>②</sup>，朝廷显然不会颁发残本，应该是回籍后京师人士寄赠。

至于“雍正志”的流通，由于商业出版业的介入而更为错综复杂。乾隆后期，汪启淑居京京师，汇辑轶闻撰成《水曹清暇录》一书，曾引用《盛京通志》所载镶红旗佐领达基之父娶妖狐为妻之事。<sup>③</sup>此事仅见于“雍正志”记载，可知该书至乾隆后期在北京仍有流传。但由于官刻本流传途径有限，多依赖士大夫个人交流，能接触该书者亦复不多。故而“雍正志”更大规模的传播要等到晚清。咸丰二年（1852年）奉天府府丞雷以誠以“雍正志”在辽沈之地“藏书家迄无善本”，乃将奉天学署藏版重加补刻，再行刷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有各版《盛京通志》存世情况，以这一补刻本为最多。诚然，补刻本质量并不甚佳，民国时学者瞿宣颖讥其“率陋之处，不可悉数”<sup>④</sup>。然而事实是，这一粗劣刻本依靠商业流通，反而成为晚清以降最流行的盛京志书，当时士人多有引用。

而“乾隆志”与“钦定志”武英殿刻本既系官修钜典，则其流通方式当与一般武英殿刻书无异。翁连溪曾就高宗时代内府刻书流传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证，清宫刻书的外部流通情况带有明显的功能性，以《四书解义》等科举讲义、《大义觉迷录》等直接宣讲意识形态的图书为主<sup>⑤</sup>，故而该书流通殊少，不难想见。光绪十八年（1892年），吉林将军长顺等不慎将库中所藏“钦定志”武英殿刻本焚毁，竟购求不得，只能奏请“再行颁赏”<sup>⑥</sup>，可谓一证。

① 徐乾学：《檐园文集》卷十《备陈修书事宜疏》，载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12册，4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②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卷六，载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920册，9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③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十一，169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④ 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第二编），载《民国丛书》，第二编，第81册，267页，上海，上海书店，1989。

⑤ 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336-342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⑥ 《吉林将军长顺等奏为暂存内署盛京通志渊鉴类函各部书籍被毁请再行赏颁以资测绘舆图事折》，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38-0027-042。



另外,乾隆时,皇帝曾许诺将来“南三阁”四库全书缮竣,江南士子可以“就近钞录”<sup>①</sup>。乾嘉之际的地理学者吴卓信久在江淮游历,一生困于场屋,无缘读书中秘<sup>②</sup>,但他在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曾有引用“钦定志”之例<sup>③</sup>,显然系“南三阁”四库抄本之功。不过,“南三阁”藏书取阅工序繁复,以文澜阁为例,晚清时旗籍文人金梁欲入阁读书,通过旗营书院呈请,一月之后方得入阁;当日文澜阁管理人员“逾午始还”,未久即称“时至,将闭门,并须入城缴匙,迟恐不及”,要金梁离开,后竟不得再入。<sup>④</sup>在这一情况下,“钦定志”的阅读无疑会有不小的阻碍。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不同版本《盛京通志》的传播过程存在明显的差异。“钦定志”虽然集朝廷之精华,成为清朝官方宣扬共同记忆的媒介,但却难得索阅,传播过程受到很大的阻碍。目前所见,读者阅读“钦定志”的记载,往往都是19世纪上半叶乃至晚清时事。与此相比,“雍正正志”及其补刻本由于商业传播,其影响比“钦定志”要大。这种传播上的差异,意味着朝廷将典籍藏诸宫中,固然彰显了“钦定志”的重要性,却也制约了该书在民间的影响力。

## (二) 士大夫读者对《盛京通志》的阅读体验

《盛京通志》的影响,在清中后期士大夫的阅读、引述与讨论中得到了体现。不同读者使用《盛京通志》时,往往怀有不同的目的,关注的重点与产生的思考也不尽相同,进而令这部方志在晚清的观念世界中呈现出十分多元的意涵,并非单一的政治文化宣教媒介。

作为展现东北地区风貌的书籍,《盛京通志》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舆地博物方面的内容。清代以前,记载东北边疆地区风土人情的图书资料非常稀少,所谓:“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呻吟愁苦之余,谁复留一字以传!”<sup>⑤</sup>《盛京通志》的纂修,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憾,成为清代士人了解东北地区情况,增广见闻、征寻遗闻的主要知识来源。例如张穆《蒙古游牧记》考证阿拉木图城历史由来,认为该城“疑即旧韩州城也”,复引《盛京通志》所记历朝之“韩州”治所沿革。<sup>⑥</sup>在这一考证中,《盛京通志》成为重要的舆地知识来源,体现出《盛京通志》对史地学的补益。再如俞正燮便曾引用《盛京通志》中关于辽阳州海城县、盖平县出产木棉的记载<sup>⑦</sup>,将《盛京通志》作为探讨东北地区植物分布的资料来源。

方志纂修学者亦对《盛京通志》多有关注。清代中后期曾有关于方志体例的争论,当时方志纂修者往往自为目次,导致志书彼此体例不一,莫衷一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著名学者章学诚为湖北省纂修通志,曾针对志书中是否应有“族望”一门,撰文申辩:

又云:“所以《盛京通志》足为各省取法。盛京岂无族望,不载家谱片言。”

今按,《盛京通志》乃钦定之书,不特为天下法,亦实可为千古法矣。议者一切未能仰窥,而独以不载族望为可取法,则天下之书不计是非,但能不载族望,便可取法。此视《盛京通志》不太易乎?……取法钦定诸志,正当绎《源流考》之部族篇、《八旗通志》之世职表而推广义例,以谱族望矣。今反引此相难,是议者目未见过钦定诸志,宜其易于言也。<sup>⑧</sup>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7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二《严长明传》附吴卓信传,59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③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七五,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1册,957页,上海,开明出版社,1935。

④ 金梁:《瓜圃述异》卷下《杭州文澜阁》,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8册,45-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⑤ 杨宾:《睇发堂文集》卷二《柳边纪略自序》,载《杨宾集》,12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⑥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1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⑦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5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⑧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卷四,255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可以看到，论辩双方都采用最后一部《盛京通志》这一“钦定之书”为当然的范本，认为它的体例“不特为天下法，亦实可为千古法”。难者以其形为据，实斋则力辨其神，从而达到“以志述道”的目的。<sup>①</sup>

除上述两类学者外，清中叶士人还利用《盛京通志》作为清朝当代史读物。由于清朝于本朝史事忌讳诸多，史狱迭兴，士大夫之有意于当代史者，往往苦于无书可凭。<sup>②</sup>而“钦定志”编纂时大量采录官修开国史资料，令《盛京通志》成为乾嘉学人私下研读、编撰清朝史传书籍的重要知识来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即为钱仪吉纂辑的《碑传集》，部分篇目直接辑录自“钦定志”传记，如《碑传集》卷三《赠大学士巴充什文成公达海传》等。一些人物事迹的记载较为零碎，《碑传集》也择要予以收集。卷四抄录两篇范文程碑传，又引《盛京通志》中关于范文程来投时努尔哈赤“伟其貌”、谓诸贝勒当“善遇之”等事，以为附录。此外，钱氏还利用“钦定志”考证本朝人物事迹，作为碑传正文的注解。《碑传集》卷三录有李绂撰《开国佐运直义公费英东传》，提及抚顺之战中费英东冒明军火炮直突阵前、为诸军先之事，李绂将此事系于戊戌年，钱仪吉抄录时按称：“《盛京通志》以取抚顺及犯火炮进军在天命三年”。以证李绂所言不确。可见，《盛京通志》成为当时一些学者考辨史实的重要依据。<sup>③</sup>

从以上对士大夫阅读《盛京通志》经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文人读者们对这部方志应用方式的多样：或稽考舆地，或格物致知，或争论方志体例，或汇考本朝史事，但这些应用基本都是碎片化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该书所包含的信息而非主旨。尽管乾隆朝两部《盛京通志》有着明显的“教化”意图，但从士人的阅读记录来看，读者并未按照皇帝的意图去体察“大一统”的政治意涵，更多的还是把《盛京通志》当作知识的荟萃，而非政治文化传播的媒介。“钦定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不是“缔构艰难”的感悟，而是丰富且翔实的山川、物产记载，以及他处难得一见的国初功臣事迹。士人读者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对高宗推动的政治文化建构过程的一种消解。

甚至有的读者还结合自己所读到的其他知识，对《盛京通志》中精心编排的历史记述有所质疑。魏源编纂《圣武记》时，述及萨尔浒之战史事，便对“钦定志”中夸称清太祖“以五百兵破明兵四十万”的记载大不喟然，谓：“兵法当垂后世，乌得为‘五百人破四十万’之呆词以疑史册哉！”<sup>④</sup>这种带有怀疑精神的阅读体验，反映出了魏源在阅读《盛京通志》时，与高宗所着力塑造的共同记忆之间存在微妙的疏离感，这恐怕是清高宗意料不到的。

本文通过梳理《盛京通志》历次纂修过程及其侧重点，以及清朝士人读者对《盛京通志》的阅读关照，考察清前期政治文化构建过程中的不同面相。在这一案例中，清朝建构政治文化的努力分为两个阶段，虽然都与“大一统”政治文化密切关联，但重心却有所变化。乾隆以前，朝廷通过东北地方文献与民间口述，收集地方文化资源，以丰富清朝“大一统”统治秩序中的空间广度，进而塑造疆域观念。而乾隆时期，朝廷以中央所保存图书、档案等资料，从国家权力及意识形态构建的视角改造《盛京通志》，着力描绘盛京地区优渥的自然条件和淳朴的社会风俗，并将这一地域同清朝开国的历史相联系。在这一改造中，清朝“缔构艰难”的共同历史记忆得到塑造，“大一统”政治文化从展现疆域空间的广度，转而强调统胤观念，由侧重“大”转向侧重“一统”。整个过程显示出，清朝政府具有强有力的统治能力，可以按照政治需要汲取地方情报、编译图书，重申其统治的合法性，强化政治

① 和卫国：《“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载《中国地方志》，2010（1）。

②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士人的思想、学术和心态》，526-5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③ 以上引文分见钱仪吉：《碑传集》，58、71、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④ 魏源：《圣武记》，卷一，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认同。

而《盛京通志》的传播、阅读史则在文本分析的范畴以外，揭示了实体媒介层面上更为丰富的政治文化实践情形。特别是在“钦定志”成书以后，虽然学者在官方语境下会叠饰嘉辞，称颂最后一部《盛京通志》“扬烈緬留都之迹”<sup>①</sup>，但在私下阅读时，他们的关注点却十分多样，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将《盛京通志》中所包含的东北地方情报与修志经验联系到个人学术旨趣上，做出个体化的理解与应用，并不单纯局限于清高宗修书的本意。同时，他们所读到的《盛京通志》也不仅是“钦定志”一种，民间图书流通渠道为读者提供了获取知识的便利。这足以展现 18、19 世纪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复杂性，提示我们对清代知识世界的更多思考。

## Building and Response of Grand Unification as Political Culture in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Case of *Shengjing Provincial Gazetteer's* Compilation and Circulation

ZHANG Yichi, LIU Fengyun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During its four times' compi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hengjing Provincial Gazetteer* (*Shengjing Tongzhi*) has been illustrating a temporally varied ideology of High Qing court about the political cultural concept of "Grand Unification". As a part of the *Grand Unification Gazetteer's* (*Da Qing Yitongzhi*), the first two editions, which were completed during the era of Emperor Kangxi and Yongzheng respectively, emerged as a medium of Shengjing local knowledge, implicating the diversity of frontier. However, the following two editions compil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were soon transformed into a central context, with knowledge from the royal cour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iterating the state authority by shaping a unique common memory of origin. On the other hand, in response to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ng process, the literati reader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rich content about Shengjing local society and nature, paying scant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cultural concept.

**Key words:** *Shengjing Provincial Gazetteer*; political culture; Grand Unification; locality

(责任编辑 张 静)

<sup>①</sup> 庆桂等编：《国朝宫史续编》，卷九一，884 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